

顧維鈞對世界風雲人物回憶記

袁道豐

顧維鈞(少川)先生剛過九秩華誕，他的才華勳業，人所共知，用不着我來贅述。他從一九二二年任公職起直至一九六六年從海牙國際法庭退休止，服務政治外交界，前後共五十四年，中間祇有極短時期息影泉林。而在這五十四年中，差不多有三十九年代表國家，在海外負折衝樽俎的重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和以後曾任駐美及英國公使，從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五六年連續任駐法、英、美三國大使，並且曾任國際聯盟及聯合國憲章的起草委員及參加過無數次的國際會議。最後從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六年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及副庭長。這是國際法學界最崇高而最受人尊敬的職位。顧先生能以此結束其終身事業，可謂最愉快、最完滿的登峰造極。這是人世間很少見的事。唯因他功業日隆，薄海同欽及態度和藹、待人以誠，人均樂與之交。在國人中，認識外國政要最多的，恐怕是顧先生了。作者三生有幸，得常有親炙機會。最近曾請以他所接觸的外國政要所予之印象相告，效錄如后，一可供作茶餘飯後之談資，一可充作正史以外的補充史料。

威爾遜

我(顧先生)認識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是六十七年前的事了，時為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當時我任哥倫比亞大學校報 Spec-tator 的總編輯。一天，普靈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校報 Princeton 的主筆邀我去晚餐，餐後他提議去訪問威氏。我素仰慕其名。他寫有一本名著「國家」(State)。他原在普大當教授，教的是法庭判例和政治經濟。我看他時，他已陞任該校校長了。他沒有架子，對人和藹。對我亦表同情。我們談話極歡。他表示要競選新澤西州(New Jersey)即大學所在地)的州長，他當選做了兩年(一九一—一九一三)。當我在一九一五年到華盛頓任公使時，威氏已任總統。是年他與一間首飾店的女主人名叫 Edith Bolling Galt 結婚。這是續絃。他通知國務院(外交部)要請我去參加婚禮。該院有點躊躇，答中國公使尚未遲遞國書。威總統駁復說：他是我的私人朋友，可不受普通外交禮節的約束。他珍惜私交有如此者。

他很客氣，請我為其貴賓，同船赴法。當時他所搭的船 Leviathan 是全世界最大的郵船。他並且說該郵船五天可抵法國，而我所乘的需時八天。我會婉謝，理由是我國政府令我儘速赴法，不能等待他的遲日啓碇的郵船。在和會中，我們保持密切的聯繫。他是最協助我國的人。

(按：故張君勳先生曾對作者說：「當威爾遜當選為美國總統時，他聞訊非常歡欣，因為這是古今中外第一次一位大學教授出任一國的元首。今後教書匠再不會被人看不起，而前途大有可為了！」)

有一次，華盛頓的著名的記者俱樂部(Gri-diron Club)歡宴中英美三國代表。威爾遜亦親自參加。照傳統祇有總統一人演講，但俱樂部主席突然提議要我亦發言。我不願違犯慣例，頗費躊躇，可是主席說總統已經應允。許多外國人以為中國人祇會說洋涇濱的英語。有一位來自鄉村的眾議員竟以 Do you like soup! 相戲。我雖不敢自誇我的英語說的特別優異，但至少可說發言清楚流利、措辭得宜，使在座人士咸表驚異！

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羅氏當了美國總統約十二年（一九三三—四五年）是美國歷史中任期最久的總統，連續四次當選。歷史學家均品評他和威爾遜都是偉大的總統。我認識他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說來奇怪，他是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同學。一九三三年威爾遜派他任海軍部次長。其時我任駐美公使。因為年齡相近，我們很談得來。他埋怨一般資歷較深和年長的政要看不起年輕的下輩。他很難幹、和藹可親、平易近人。那時候，他不過而立之年，已經嶄露頭角了。數年後，他當選任紐約州州長。

羅氏以法國已敗，日軍已佔領安南，對我建議中國是鄰邦，似可進佔安南，取法國的地位而代之，橫豎美國絕無佔領他國領土的野心。其實，我國既無軍力，也沒有奪取鄰國領土的意向。

我最後一次到白宮和羅斯福談話，是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三日。他一見我便說：「我真高興重見多年未見的老朋友，我尤其非常高興看見你以中國首席代表的資格來參加聯合國起草憲章的會議……」我也表示承他接見，衷心異常欣慰和榮幸。老實說，美總統的那種濃厚的人情味，在外國元首中是不多見的，使我至今仍保存極良好的印象。可惜不多久後，他便與世長辭了。

杜魯門 (Harry S. Truman)

他是一位出身貧窮，刻苦耐勞的人。我國有過一位賣布出身的總統（曹錕），而美國却有一位經管衣帽雜貨店的元首。前者遺臭萬年，後者則流芳百世。杜氏為人廉潔正直、儉樸純厚。他

說話很爽快坦白，非常誠懇。他從不用外交辭令，繞圈子說話，他在任時一九四五—五三年，適值我國內多事之秋。因此，我曾晉謁數次。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比方我們談到重要問題時，他會說：你去找馬歇爾將軍談去，他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杜又說：他對中國極表同情，中美關係容易解決。但在他的著述中，對我國的軍政界人物，不無微詞。

有一次，他邀請我國某政要和我去午餐。菜單是鮮蝦（Shrimp Cocktail）、烤雞夾有蔬菜、冰淇淋和紅酒。這與我國的盛筵：四味冷盤和八味佳肴比較，實在簡單多了。美國朝野說這是事務午餐（Business Lunch）。

一九七二年，杜魯門以八十八歲高齡去世。杜夫人特別照閣國務院，須通知我去參加其殯儀，我因此特赴華府弔喪。

說來奇怪，這位起初為人所輕視的杜魯門，現在歷史學家盛讚其事蹟，稱他為美國總統中有成就的一位，或稱他是幾近偉大的總統（nearly Great President）。前總統福特心儀其人，特別在橢圓形辦公室牆上懸掛其玉照。現任總統卡特，對杜氏更表示無限的仰慕，請求杜魯門圖書館，將杜任總統時在辦公桌擺著的一塊銅牌借給他用，這牌上鑲有 Bug stops here（推卸責任止於此）。我往昔去晉謁杜總統時，一進其辦公室，就看見這啓人深省的警語。

艾森豪 (Dwight D. Eisenhower)

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統率數百萬聯軍擊敗

納粹德國的統帥。他體格魁梧，穿起戎裝，真是一表人物，也可以說是一位典型的將軍。他是勝利的英雄。戰後又當過參謀總長和北大西洋公約的聯軍統帥。他想做總統，但美國人是不歡喜軍人當總統的，生怕軍人好戰和專權；而且過去軍人當總統的，除華盛頓外，都沒有什麼良好的政績。為了沖淡他的軍人色彩，艾氏便當起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來了。因此，他由軍人變為一教育家。我以哥大的校友資格去看他，立承接見。他態度和好，笑容可掬。談及母校的情況頗詳。他說Mami（即其夫人）也很想見我，可惜她早已有約外出了。

我覺得艾氏是一位福將，也是一位好運氣的總統。一九五三—五六年，他在任期間是美國的富強登上巔峯的時候，世界局勢亦遍地和平。可惜他對政治沒有多大興趣。因此，他雖極孚眾望，但缺政治領導能力。歷史學家並不讚稱他是一位偉大總統。可見一個人可以當指揮若定，摧毀強敵的統帥，但不一定可充推動新政、適應潮流的政治領袖。

赫爾 (Cordell Hull)

在羅斯福時代，赫氏任國務卿（外交部長）達十一年之久，一九三三—四四年。在美國歷史上，要以他任此職最久，並且是在國際形勢最險惡和戰爭遍地的期間。我記得一件事，赫爾曾盡其最大之努力，協助我國成為四強之一，後來順水推舟演變為五強之一。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美英蘇三國外交部長開會於莫斯科，預備開羅及德

黑爾元首會議。羅斯福堅決要求三國外長的宣言應加中國，成為四國宣言。史大林却反對加入中國。赫爾非常憤懣。他奉羅總統的訓令如要求加入中國不遂，即返美國，以示抗議，並令屬員預備火車，以便離莫。蘇外長莫洛托夫聞訊，即報告史大林。史因在其他方面亟需美國的援助，便表示讓步，接受列入中國。我國駐蘇大使傅秉常乃得參加四國代表會議。赫爾老成持重、深謀遠慮，實為一不多見的政治外交家。邱吉爾讚他為「英勇的老鷹」。

馬歇爾

中國人對馬歇爾將軍 (George Marshall) 的印象以互相賞識，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任美國的參謀總長，運籌帷幄，精闢略。有人說，美國的能戰勝德日，他應居首功。的確，他在戰時和戰後的聲望很高。因此，他本人不免有點飄飄然自視為風雲人物，不可一世。杜魯門總統想利用他的威望，給他一個很艱難的使命，派他以特使資格，到中國去調停國共衝突。

馬歇爾的使命的失敗，是大家知道的。他返國後，歷任國務卿和國防部長。因為時局的關係，我見他的機會甚多，可以說較見美國任何政要為多。我始終牢記着他他是軍人出身，他特別具有軍人的氣質。他非常直爽，有話便說，不管對聽者是悅耳與否。有一次，我們談我國的東北軍事情形，我說我的最近消息是國軍在堅守陣線，他答：我剛接在東北前線的美國軍官來電，你們的軍隊已潰敗撤退。讀者可以想像我當時的感

應。

他不多言，但言必中肯誠實，絕不委婉其詞。有人聽他說過：「我所要求於屬僚的是爽直真誠」。他的言行很難使他和傳統習慣不同的東方軍政要人和洽相處。其使命失敗，誠非偶然。但他心裏非常憤懣。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不過是一上校，但他在戰場秘密調集一百萬大軍擊敗德軍。當時的美軍統帥潘興 (John J. Pershing) 對他非常讚佩。丹登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羅斯福不次擢陞馬氏為上將參謀總長。當時他不過為一準將，在他上面的還有數百位比較他資深的少將、中將等。人均佩服羅氏有知人之明。

馬氏任國務卿時，有一次請我去餐敘。他關照我：請你不要將這便銜消息告訴外交團人士，因為我是不歡喜外交酬酢的。而此次邀請閣下便餐是例外之舉。

麥克阿瑟

我們過去常看見這位大將穿着戎裝，口含煙斗。他曾奔走疆場，出生入死。的確是一表人物。艾森豪在菲律賓當過他的參謀長。在大戰時，他們倆體格魁偉，一東一西，倒反映出美國軍力的雄飛世界。

我見過他兩次，地方不同，時日亦異。一在東京，他正聲勢喧赫、趾高氣揚。一在紐約，他已革職退隱，意志消沈，住在紐約最豪華的旅館 Hotel Waldorf Astoria。他穿着普通西裝時，沒有穿軍服戴軍帽的那種英雄氣概。他對我很開誠佈公，也很禮貌。他剖析世界局勢和美國

政府甚詳。很奇怪的，人人都以為軍人好戰，但當一九六〇年甘迺迪總統對麥克阿瑟與艾森豪商詢越南情形時，他們都一致反對美國介入那裏可能發生的戰爭漩渦。

艾其遜 (Dean G. Acheson)

杜魯門任總統時，他曾任副國務卿和國務卿 (一九四九—一五三年)。中美關係白皮書就是他力主發表的。他本人的對華態度如何可想而知。但是我不能否認他是一位才華超群、驕傲成性的人。他能說能寫、精明能幹。他是名律師。要應付他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高個格兒，八字鬍子，衣冠楚楚，遠視之悅視中古世紀的貴族。他寫了一本回憶錄，書名是「Present at the Creation」八百頁，內容豐富，的是一本好著作。我和他見面頗多，商洽中美兩國間的嚴重問題，但因彼此立場不同，結果實欠圓滿。

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一九五三—一五九年，他任艾森豪總統的國務卿。他的岳父曾當過第一次海牙和會中國代表團的顧問，嗣又充任中國駐美使館的顧問。因此，他對華抱有好感，而對我個人私交亦甚篤。他是冷戰中的英勇鬥士，也是「圍堵政策」的推動者。他是一位名律師，但富有學者的氣質和風度。因為艾總統對外交不感興趣及不過問，他便能主持美國外交，幾能隨心所欲，發揮其主張。一九五六年我奉召離職返國時，他夫妻均表驚異，甚至自願私電總統准予慰留，但為我所阻。我

攻。這是極機密的情報，請勿告他人。」我們多年來培植了深摯的友誼，他有好幾次對我說：「我剛才告訴你的事情請不要對他人告，連你的政府在內。」

邱氏很健康，我問他何以保健，他答得很謙：「能坐時不站，能躺時不立。」人多評擊他過份煙酒，他的答覆是：「我得之於煙酒者比煙酒得之於我的還多。」可謂幽默之至矣！

艾登 (Anthony Eden)

艾氏出身世家，身軀魁偉，翩翩公子，可說是一位瀟灑英俊人物。邱吉爾很歡喜他，因此栽培提携，不遺餘力。艾登前後當過外務大臣十年，初任時是全世界最年輕的外交部長。他和我年齡相近，所以很談得來。除我出使英國時期外，在國際聯盟和聯合國，我們也常有商談的機會。

一九五五—五七年，艾氏當起首相了。邱吉爾所期望於其弟子者，今得如願以償，非常高興。不幸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英法和以色列國大舉進攻埃及，佔據蘇彝士運河。事前美國毫無所知，乃大發雷霆，在聯合國大會嚴厲抨擊英法。她們在美、蘇聯和國際輿論強烈壓迫之下，祇得撤兵。艾登因此一蹶不振，直至前兩月逝世，沒有再登政治舞台。

阿特里 (Clement Attlee)

一九四五年他繼邱吉爾任首相，他是工黨領袖，非常文雅，有儒者風。次年，他邀請我到一極華貴的俱樂部筵敘，女人是不許進入的。他詢

及我國情形甚詳。並說他素不歡喜請客，約子同餐，實屬例外，蓋欲相與暢談也。

克里蒙梭 (Georges Clemenceau)

我和他祇在巴黎和會時相遇好幾次。他是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內閣總理。法國人給他一個綽號「老虎」。這有如袁世凱被人笑稱為「蛤蟆」和邱吉爾被漫畫為「牛頭狗」(Bull-dog)一樣。克氏以虎 (Le Tigre) 名，一因他狀似猛虎。二因他當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節節敗退時，他出來執掌閹揆，凶猛異常，不屈不撓，矢志反攻。他常視死如歸，親臨戰場。當時雙方軍隊壕溝相望，語聲相聞，他舉起拳頭，對德軍怒吼：「你們一群豬、私生子！我要宰你們！」一九一七年，幸美國參戰大軍開到，老虎乃得償其「我的唯一目的是戰勝」的夙願了。

在巴黎和會中，老虎並不怒吼，反而一聲不響。我推測他的想法是這樣的。美國對我國極同情，法國剛得到她的援助參戰，才獲勝利，因此，開罪賽姆叔無異恩將仇報。日本呢，她在遠東凶焰萬丈，法非其敵，何況兩國已簽有密約，准許日本奪取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中國呢，是俎上肉，宰之割之，她也無力反抗。因此，老虎總理對我國是不同情不憐惜的。但他很機智，一切於我國不利的話讓英首相路易喬治去說。祇到了大家要攤牌，出席代表非說明他的態度不可時，他才胸有成竹似的說：「英國的立場，就是法國的立場。」

法國人譏老虎為蒙古人。原因是在十二世紀

和十三世紀時，成吉思汗的軍隊曾進佔匈牙利，匈國的人種是馬札兒人種，即蒙古種。克里蒙梭的祖先因不堪成吉思汗部屬的壓迫，乃逃難到法國。究竟他有沒有蒙古血種，那祇有讓歷史學家去「大膽假設、小心考證」了。

白里安 (Aristide Briand)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歐洲最享盛名的外交家是白里安了。法國非常強盛，稱雄歐陸。白氏運用其機智，大施其結盟政策。羅加拿協約與美國國務卿凱洛克共同發起的非戰公約，均旨在維持和平。和平如能維持，即法國霸權現狀可以繼續，為計之善無有過於此者。我們知道法國的閣潮是很多的，一年數易，亦屬常事。但白氏為一不倒翁。他主管格多賽 (Graig Orsay) 外交部所在地) 比任何人為久。

白氏確極能幹，口才流利，腦筋清楚，他的舉止、談話，甚至食相，都帶有紳士氣派。國際聯盟開會時，我們晤談頗常。有一次他邀我喫飯。這是一間小型飯店，極著名，但在鄉間。他說昨天他特別到此飯店，和老板娘商量今天的菜單。他的隆情厚誼，令我永誌不忘。我們當外交使節的，參加正式宴會時，人多言雜，說的都是不關痛癢的話。如到政府機關去訪問要人，談話都是硬板板的問題。凡此都很少人情味。祇有兩個人的 (Tate & Tate) 同席共餐，才能傾懷暢談，培植友誼。語云：「大夫無私交。」如果兩國間有生死亡的問題，此語有相當道理，但兩國間和戰關鍵的衝突究竟是少，普通都是次要問

題。那末使節如與駐在國總統或外交部長有私交，便佔便宜。比方兩國國力懸殊，大使要想求見強國外長或元首時，外長很可能指定一位次長接見。反之，如果兩人有友誼，他便不好意思不接見好朋友或老朋友。人究竟是人，人情還是有的，還是要的。

貝當 (Henri-Philippe Pétain)

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國慘敗投降，政府遷至維希 (Vichy 溫泉勝地)。貝當出來組織傀儡政權，與希特勒合作。他的辦公處設在一間旅館，已喪失巴黎愛麗舍王宮那種美奐美輪了。因為我國大使館隨法政府播遷，我住的旅館和其辦公地點祇隔數條街，我常看見他緩步公園或街衢。我對他需作一次禮貌上的拜訪。他埋怨的說：「我的內閣總理完全不讓我知道國事，完全靠你才得知消息。」他堅要我多留，以便詳談。

我真不瞭解貝當為什麼願意做傀儡。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堅守凡爾敦 (Verdun)，使德軍不能越雷池一步，雙方死傷百餘萬人。他又率軍衝破興登堡防線。他功勳彪炳，榮膺元帥，法國人民無分上下，莫不敬之愛之，有若英雄。一九四〇年他以八十四的高齡出來主持國政。即在平時，任何人都會感到暮年力衰，難負重任，何況是國家在慘敗後瘡痍滿目，民心渙散。聯軍勝利後，他束手就擒。法庭以貝當犯有叛國罪，把他叛處死刑，戴高樂以其年邁，減刑為終身監禁。一九五一年死於獄中，時年九十有五。他一念之差身敗名裂，可云慘矣！

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我曾在倫敦見過他一次。我對他的印象並十分深刻。他身高七尺，非常驕傲、言詞凌厲。雖法國已經敗亡，但他滿腦子仍縈環着路易十四和拿破崙的偉蹟。我倒佩服他的愛國熱情，復國信心、排除萬難、勇往直前。因為他桀驁不馴，妄顧現實，羅斯福、邱吉爾和他很有芥蒂。結果在一九六〇年代，戴氏嚴令北大西洋公約在法國的軍事設備和大本營離開法境，中了蘇聯離間公約國家的毒計，令親者痛仇者快。

法國雖屬名列為戰勝國之一，但國力衰弱，不為人所重視。記得在舊金山聯盟國家討論聯合國憲章時，法國很想列為五強之一，但有困難。我國曾助它獲得這種地位。美英蘇中四強代表開秘密會議時，法國代表邦庫 (Paul Boncour) 老是站在會議室門外等我供給他的消息。我出使巴黎時，我們倆交誼頗篤。他很愛慕顧惠慶大使的姪女 Hilda Yen，讚稱她是中國的美女。

我願在此附述戴氏的一件有趣的故事，當我出使法國時 (一九三二—四一年)，他是一位沒沒無聞、命途多舛的軍官。古云：「立言、立德、立功。」戴高樂是以一本書立言立功的人。這在歷史上是不多見的。一九三四年他寫了一本書，名叫「趨向職業兵制」(Vers l'armée de métier)，內稱將來的戰爭必取決於大量飛機及裝甲部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閃電戰術，轟炸敵國陣線及軍事工業等，使其一蹶不振。兵士須受嚴格的技术訓練，使其成為職業軍和精兵，可

以以一當十。他大聲疾呼，要求政府採納他的意見，加以徹頭徹尾的改革。但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原來主持軍部的元帥將軍們都是頭腦陳腐和頑固的軍人。他們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着重陣地戰和壕溝戰，那末將來也必定是同樣型態的戰爭。否則法國糜費數百億元建築馬奇諾 (Maginot Line) 防禦工事何為？這是金城湯池，天塹豈能飛渡。因此，戴氏的軍事學說被目為異端邪說，不值一文。匪特此也，連他由上校陞為準將的希望，都沒有可能了。

他那本書，在法國祇銷售一千本，但在德國，其譯本却列為名著，暢銷甚多。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執政，整軍經武。他的軍佐視此書為「孫子兵法」，即如法炮製。勸國人少吃麪包牛奶，而多製飛機坦克車。大戰爆發，德軍的裝甲師 (Panzers) 以大批飛機，避堅攻虛，由比法邊境浩浩蕩蕩，長驅直入，不到三星期便迫使法國二百萬大軍束手待俘，二百多名將軍屈辱投降。馬奇諾防線一點沒有用場。在這兵敗如山倒的時候，祇有戴高樂曾在某一戰區率領坦克軍隊猛烈抵抗。無如大勢已去，難抵狂瀾。但法國的敗亡，却發揚了戴氏的威望。法國人欽仰他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學家，高瞻遠矚、明察未來。他能登高一呼，領導自由法國，為國家爭生生存者其因在此。他能於戰勝後，以英雄姿態昂首邁步，經過凱旋門及五造共和者，其因亦在此。

在戰前不久，他以可憐相向財政部長雷諾 (Paul Reynaud) 嗣任內閣總理) 哭請轉向參謀總部進言，准予擢陞為準將。雷氏好奇的問：「

日本佛教之不同於中國佛教的諸問題

釋聖嚴

一、前言

不論何種宗教文化，凡從一個區域移至另一個區域之後，必定會因環境的不同而產生變化。佛教從印度，經過五、六百年的傳譯^①，即產生了異於印度的中國佛教。原因不僅在語文的不同，更在於文化背景的不同。

在中國佛教形成的同時^②，此一新生的文化，也輸入了鄰接於中國的朝鮮半島及日本。

二、佛教輸入日本

日本的佛教，是自中國及朝鮮半島輸入的^③，在佛教輸入之前，只有語言，而沒有他們自己的文字，所以，他們僅將漢文的佛典接受過去^④，爲了解解佛典，始由僧侶發明了代表日本語言的符號所謂假名，對於漢文佛典，根據日本語法，加以註音及解讀^⑤。他們因此而運用漢文，作爲寫作日本一切文書的工具。日本人試着用他們自己的語文，直接寫著的，則晚在鎌倉時代(1192—1333)才^⑥。

於是，佛教傳入日本，不必像從印度傳入中國那樣，他們省去了數百年的翻譯工作。在中國形成的富於中國色彩的佛教著作，他們也照着

原樣抄寫了接受過去。因此，便自然而然地給出一個印象：日本佛教，不過是中國佛教的翻版，縱有不同之處，也不致有多大的出入^⑦。正像錫蘭上座部(Theravada)系統的佛教，是照着印度的Pali語系的佛典的原樣，接受過去，雖然離開了印度，仍與印度時代的情形沒有多大的變動。

其實，日本的情形頗有不同。

三、文化背景的不同

從文化背景上說，日本不像中國。在佛教傳入日本之初，雖也有過贊成及反對的兩派，作了激烈的抗爭，反對的一方，把佛視爲「蕃神」——外邦人的神，若拜祭外神，恐將導致國神之怒^⑧。其實，那祇是出於兩個民族之間的權力之爭。從那以後，佛教在日本，乃是一帆風順的。不像佛教傳入中國之際，中國在各種文化上，均已有了高度的成就。產生於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之中，降及漢代，則以儒家爲中心，而以道家及法家爲輔助，當時需要從西方引進的，不是宗教文化，而是西方的各種商品，佛教最初是隨着西方的商隊，從中央亞細亞傳到中國的，並且僅受西方的商人們信奉^⑨。嗣後被中國的士室中人接觸到了，

漸漸在中國人的社會中擴展開去^⑩。可是，一開始便受到中國原有文化的排拒，經常是來自儒家及道家的彈壓，歷一千數百多年，這種情勢，仍未改變^⑪。儘管佛教在中國的思想文化及民間信仰中，已經根深蒂固，並已與整個的中國文化無法分割，從正統中國的知識人的立場看，佛教仍是外來的事物^⑫。在中國的政治史上，以儒家思想作爲統治人民的張本乃是常法，偶爾採用法家或道家的思想，作爲朝廷施政的原則^⑬。至於佛教，從來未被考慮到作爲政治思想的準繩。

縱然，在許多的大乘經典之中，強調王臣護法^⑭，而將護持佛法的責任委託給國王大臣。此一理想的最佳標榜，便是轉輪聖王^⑮，可惜，此在印度佛教史上，僅出現了一位Asoka王，而到他晚年却極悲慘，在中國曾有一位梁之武帝(502—549在位)護持佛法極虔誠，晚年時也很不如意^⑯。至於其他中國史上的君王們，對於佛教，不是出之於權力的統制，便是用作收攬民心的工具而已。

再看日本，在佛教傳入之前，她除了原始信仰的神話傳說之外，沒有任何高度的哲學和宗教，當時的神道(Jindo)教，僅是宇宙的開闢神話結合着祖神崇拜的信仰而已^⑰。故當接觸到佛教

之後，便接受了佛教的信仰，當然，作為開闢日本文化第一位功臣的聖德太子（593年二十歲被立為攝政），在吸收中國佛教文化的同時，也吸收了中國儒家、法家、道家的學說。然而，在其所製共計十七條的憲法之中，第二條即是規定人民必須歸依三寶，而稱「其不歸三寶者，何以直枉」。原因是，日本之能享有大陸文化，主要是靠佛教徒傳入的，佛教徒傳入了大陸的佛教，也將中國固有的學術思想，帶進了日本。中國後漢時代的明帝，派遣使節往西域求取佛法的傳說，尚有可疑之處^⑮，日本政府自六、七世紀開始，經常派遣僧人到中國求法，則為事實^⑯。漢民族的中國歷代王朝，為佛教信仰，重視佛教而派遣僧人或使節出國者，極為罕見^⑰。早期由西方來中國的佛教僧侶或翻譯家，均係出於他們自發的傳教熱忱，由政府邀請而至中國的，僅有北方的胡族王朝的統治者，苻堅（357—358 在位）派兵邀請鳩摩羅什，至於漢族王朝如唐太宗時代的女樊三藏（600—654）留學印度，政府未贊助，且有關於的禁阻^⑱。另外一位鑑真律師，在唐玄宗天寶年間，為去日本傳教，經過十一年頭，五次偷渡出境失敗，第六次（753年）偷渡，始告成功。可見中國環境對於佛教是相當苛刻的^⑲。

若說將佛法弘揚，託付於國王大臣的護持，此在日本，是理想的地區，從欽明天皇（540—571）至現在的昭和天皇（Showo tenno）為止，九十六代之中，剃髮出家的竟有四十代之多^⑳，至於王子出家的尚不算在內，故在日本的寺院之中，凡是歷史較久而規模較大的，多少均曾

與日本的皇室、或公卿大臣、或將軍武士、或分封各地的領主大名發生過關係，有很多寺院，稱為門跡（Monsek）意思即是皇子、皇族、攝政家的子弟出家的寺院。所以，佛教在日本，從外來的宗教，很快地變成了鎮護國家的宗教。同時也將民族的祖先崇拜，與佛教信仰融合為一^㉑。中國的歷代王朝所採用的是儒家的祭典儀式，並且常用依據儒家的倫理觀念所建立的王法，施之於佛教的沙門，例如規定沙門禮拜父母及君王的法令，在中國佛教史上屢屢出現^㉒。故也從未考慮將佛教的儀式，作為國家的祭典。此在日本，因為佛教已融合於其祖先崇拜之中，所以佛教的儀式，從七世紀始，便得到了王室的公認^㉓。

由於佛教的信仰與祖先崇拜合流，到了八世紀末，自然地形成了神佛合一的思想，即是說日本的諸神，均係菩薩及佛的化現，名目雖異，實則相同。此在佛教的主要根據，是法華經如來壽量品的本迹二門說，及大日經的本地加持說，從佛的本地法身，化現各種身份，稱為垂迹。這樣一來，日本的各種祖神，均被加上了佛菩薩的頭銜^㉔，乃至江戶幕府時代的開創者，十七世紀時的德川家康，也被稱為東照大權現，意為大菩薩的化現者。佛教信仰與民族祖神結合的結果，佛教便成了日本民族不可分割的一種文化。

在中國早期的佛教徒們，也曾企圖以佛菩薩化現的觀念，來說服中國儒家及道家的信從者，比如出現得頗早的一部「清淨行法經」^㉕，即稱佛派了三位弟子，到中國教化，其一為儒童菩薩名孔丘，二為光淨菩薩名顏淵，三為摩訶迦葉名

老子。可是，在道教方面，旗鼓相當地，也有一部「老子化胡經」，說老子涉流沙，教化胡王，死後轉生為佛^㉖。佛教未能以化現的思想說服中國人，反而被道教徒利用這一思想，說印度的佛，原是老子轉生。以之與日本相比較，即可見出中國與日本，對於佛教而言，是兩個不同的環境了。

四、宗派與教團的不同

佛教在中國，雖有各種宗派的名稱，也曾有各宗派的寺院和僧侶，但是從未有過行政系統的教團，歷代王朝之統制佛教，雖也曾將佛教寺院及僧尼作過宗派型態的分類，却未有過各宗自成一行政單元的局面。所以中國佛教的各宗派，不是教團組織的建制，乃是就教理之研究所依經論的不同而產生^㉗。或者如禪宗，則因修行的家風不同而分門別戶。也由於如此，佛教在中國，從未引起過武力的暴動^㉘。利用宗教信仰，結合群眾，與政府對抗的，在中國歷史上，祇有漢末附於道教的黃巾黨，另有元及明代借彌勒佛降世為名的白蓮教。均與佛教無關。

在日本則不然，第六世紀以後的日本，對於中國文化的吸收及模仿，如飢似渴，一批又一批的留學者及僧侶，隨著使節的派遣而到中國，學習政治制度、佛教教理、以及建築的藝術等。日本民族的特性之一，是崇拜成功者，也模仿成功者的作為，並且模仿得非常神似，故當那些學者及僧侶們，留學回國之後，政治方面的官制服飾，建築方面的殿宇配置及其形式，佛教方面的各

宗教法物，均儘量地學習了去，以致直到今天，唐代的殿宇建築的形式，在中國已見不到了，却可在日本的奈良Nara及京都Kyoto見到不少。雖然那些建築物，大多已經過數次重建或整修，它們的型態，依舊保持着原狀。

在佛教方面，亦復如此。六、七世紀間的日本佛教，他們稱為古宗的六宗，均係由於研究範圍的所依不同的經論而作的區別，與中國佛教相似。

到了八、九世紀之時，由最澄及空海、(Kukai)留學中國，傳入了天台宗及真言宗，便顯著地現出了日本佛教之異於中國佛教的現象。最澄雖是日本天台宗的始祖，他在中國留學期間，都接受了天台、律、真言、禪的四宗。此為日本天台宗之開展出天台密宗的重大因素，最澄以為凡是中國的，均應該學，所以學了四宗而集於他一身。其實在中國，這種情形是不曾有過的。另外，因他在中國受了菩薩戒，一回回日本，便把他先前在奈良東大寺受的小乘比丘戒捨掉³²。獨立門戶，倡建大乘圓頓菩薩戒壇，與奈良的舊佛教，分庭抗禮。這一來，便形成了天台宗的組織系統的教團。空海與最澄同時，也建立起真言宗的教團。此在氣勢上及形態上，均顯出了新佛教的特殊性格。

教團的體系完成之後，即有了排他性，為了護持自己的教團不受外力侵擾，各教團也擁有了防衛的兵力。到了十五世紀，即因各教團的武力相衝突，加上與各地方勢力相糾結，形成了許多次暴動事件³³。以致到了十六世紀後期，天台宗

等幾個大宗派，所擁兵力，竟可與各地分封領主的大名相拮抗的程度，當時有一位叫做織田信長的大名，有志將割據的領主們統一起來，也把天台宗的大本山——比叡山，當作攻略的對象，結果把該山攻克之後，燒毀了全山所有的寺院³⁴！像這種事件，在其他亞洲各國的佛教史上是從未見過的。

五、崇拜對象的不同

佛法的本質，是主張依法不依人的，印度的釋迦牟尼佛，曾宣佈他不是統制群眾的領袖，他祇是群眾中的一分子。密宗及中國的禪宗，重視師承關係，那是弟子們對於法的源流相承的重視，並不表示對於某些特定個人的崇拜。尤其中國的禪宗，常用得月忘指，或得魚忘筌的比喻開示初學的人，意謂一切可用語文形象表示的教訓或指導，祇是指點月亮在何處的手指，當你見到月亮之後，便該把那指點月亮給你看的的手指忘掉；魚筌指示你是否已經有魚上了鉤，你當把握釣走了鉤的魚，而不是釣絲上的那個浮標。所以，佛教在印度、在中國，對於特定個人的崇拜是不受鼓勵的。

日本民族，從其對祖神崇拜的觀念，連鎖性地推演，便形成了對於若干特定的個人崇拜。他們日本民族是神的子孫，子孫應敬其祖神，天皇是神族直系的代表，故應崇拜天皇，為天皇辦事的公卿大臣，代表了天皇的意志，故也必須服從，地方官吏以及武士，是執行公卿大臣所頒政令的人，庶民對之，亦宜如事天皇³⁵。此在原則上

，是崇拜他們最高的祖神，事實則是崇拜故事與他們有直接從屬關係的個人。日本人對直屬上司的絕對服從，被視為天經地義，如果被發現有背叛的意圖，那是無可饒恕的行為。正因為他們僅對直屬的上司效忠，如果對於同等或平行地位的人，有了猜疑，便將之視為背叛上司的人，如果雙方均有群眾勢力的話，便會引起一場鬥爭。在中國，有兒女替父母報仇的故事，在日本更有敗落武士的部下，為他們的主人復仇的事實³⁶。

由於這種特定的個人崇拜的民族特性，佛教傳到日本，也在這個模式之中成長起來。凡到中國留過學的僧侶，無不強調他們在中國所師事或接納了他們的那些特定的個人，將那些特定個人的一言一行，視為至高無上的指導原則，並且相信唯有那些特定的個人，才代表着真正的佛教。比如日本真言宗的創始祖空海，強調惠果的地位，曹洞宗的道元，強調如淨的地位。可是，他們自己的門徒們，又將空海及道元等崇拜為佛教的最高代表者。日本佛教各宗的祖師們，除了日蓮，沒有人自覺地要創出一個門派³⁷。他們祇為忠實於他們所特定崇拜的個人之見地而作全力的宣揚。弟子對師承的思想沒有懷疑的餘地，平等地位的弟子之間，對於師承思想的解釋，如果發生爭執，便會形成宗派的分裂與再分裂。因此，到一九四〇年，日本佛教，共有十三宗五十六派之多，每宗之下各有若干派別，均係對於祖師思想所作解釋之不同而自立門戶，但他們無一派不強調，唯有自己這一派，才傳持着最究竟的佛法，才是他們的祖師的真傳。

由於對特定個人崇拜的民族性，日本佛教特別崇拜各宗自家的創始祖師，同時也崇拜各寺的開山建寺的第一代主持。在日本可以發現，各宗的祖師殿，要大過佛殿，比如淨土宗的源空，淨土真宗的親鸞等的偶像所在的建築物，均大於佛殿。除了祖師偶像，各寺院也無不供有他們第一代開山住持的偶像。此在中國以及其他國家的佛教中是不會見到的。

基於崇拜開創者之心理，不論是傳自朝鮮半島或中國大陸的各宗派，或者是由於日本人在其國內自創的各宗派，以及他們的根本寺院，雖經過多少次的興衰起落，毀壞重建，迄今沒有一個宗派不是活着的。

日本的佛教，在歷史上曾經過兩次大的改變，一次是第八世紀時，天台宗及真言宗的創立，給舊有所謂古京六宗，帶來了極大的震撼。第二次是十二、十三世紀時，淨土宗、淨土真宗、禪宗、日蓮宗的相繼創立，又使天台宗及真言宗，產生了危機的感受，可是每經一次變革，出現了新宗派，也刺激了舊宗派的復甦運動。正像十六世紀Martin Luther(1483—1549)及Calvin John(1509—1564)所倡導的宗教革新，也為羅馬的天主教會帶來復興的機運。因為日本人對於創業者的祖師們，抱有極崇高的敬意，不論是由於什麼原因，凡是跟這些祖師中的任何一個，發生了關係，縱然是間接的，乃至是從文字上認識之後，他便會死心塌地地為這位祖師的理想努力到底。例如源空，創立淨土宗的原因，僅是讀到了中國善導大師(613—681)著的「觀無量壽

佛經疏」。故在日本佛教史上，見有新宗派的生起，却未見到舊宗派的滅亡。他們對於各宗所屬的古蹟，也無不善加維護及整修。

反觀中國的佛教，則頗令人哀嘆了，以宗派的學術思想而言，曾經有過大小乘共計十三宗派^{③④}。到本世紀，華嚴及律宗，附屬於禪寺，天台及淨土的專修寺院數目極少。絕大多數是禪宗寺院。其他各宗的僧侶及寺院早已消失了。禪宗在中國，曾有五家七宗^{③⑤}。近世所存的，僅僅臨濟及曹洞兩派而已。至於歷時近二千年來，所留佛教的文物古蹟，凡是金屬及木造的，已經很難搜尋，所幸尚有古代的石窟、石窟、石經、幢塔，供人憑弔欣賞而已^{③⑥}。這是什麼原因，頗足深思。

若照儒家的思想而言，古聖先賢是受尊敬的，但他們是人而非神。法家的思想，則主張「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③⑦}，是後來者優勝的歷史進化論者。故對於古人的情感，很難達到崇拜的程度。加上儒道兩家，始終把佛教視作外來的事物而加以排斥，希望一般的中國人愛護佛教的歷史文物，是很困難的。

從中國佛教的內部而言，自第九第十兩世紀的唐末之亂以來，知識階層的佛教，漸漸消失，殘存下來的是山林的佛教，所謂不立文字的禪宗，他們潛心於樸實的修行生活，無暇顧及殿宇之莊嚴及古物的保藏。他們也建立寺院，却抱著「空花佛事」及「水月道場」的觀念，隨處隨時建立的寺院，也可能隨處隨時受到破滅，被破滅了，也不會引起任何煩惱。這思想固然是淵源於印度佛教的「無常」的教說，但也是中國禪宗的特

色之一。唯有如此，才能適應中國的環境，他不能拘泥保守一定的形式。孟子說的「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可以用來描寫中國的禪宗。在唐末以來的中國佛教，幾乎經常是處於獨善其身的局面，因為宋明時代的儒學抬頭，佛教在整個中國文化活動的狀態下，是處於劣勢的一方。所以中國禪宗的本質是積極的，數百年以來的表現，却是消極的。此與日本的佛教是頗有不同的。

六、對於國家觀念的不同

日本的道元禪師，於一二三三年到中國求法之時，中國曹洞宗的如淨禪師，尚叮嚀他於回國之後，「不可親近國王大臣」^{③⑧}。這正說明了當時的中國佛教，是處於孟子所說「窮」的境況下。道元對於如淨的教訓，當然是終身以守的。但是日本民族在祖神崇拜、天皇崇拜的特性之下，國家觀念特別強烈，自奈良Nara時代的古京六宗，而平安時代的天台宗、真言宗，直到鎌倉時代的各宗，無不強調護國的思想。臨濟宗的榮西著有「興禪護國論」，日蓮宗的日蓮，著有「立正安國論」，曹洞宗的道元則著有「護國正義」，奏奉朝廷。道元雖遵守如淨的教訓，不親近王臣，他仍不像南宋初期的中國禪僧。中國禪僧雖也主張報國家之恩，那是四恩之一，其他三項則為父母、三寶、眾生，却不會單獨強調護國思想的^{③⑨}。

在佛教的立場，國家界限、種族界限，均不是問題，否則即成了局限於某一國家或某一民族的宗教。在釋迦牟尼當時的印度有十六大國，釋

遊或道後，週遊各國，留在他祖國的時間並不多。可是日本人熱愛他們自己的國家，他們不習慣留在外國太久，像中國的玄奘那樣留學印度十七年，日本佛教史上是沒有的。日本僧人到中國求法或巡禮的期間，均不太長，他們大多聽不懂中國話，僅能看懂中國畫^④。他們很快地就想回到日本去，所以他們對於國家的愛護及效忠是無可選擇的。

由於日本僧侶，很少能懂中國話，有名的幾位日本佛教史上的留華學僧，無不如此^⑤，他們自以為能夠理解漢文佛典的意思，其實是照着他們自以為是的解讀方法來理解的^⑥，尤其漢文沒有嚴格的文法軌跡可循，加上日本人對於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及風土人情的不甚了了，誤解之處是相當多的。此從親鸞、道元^⑦，尤其是日蓮的著作中^⑧，所引漢文佛典的解釋，可以證實。日本僧侶，是依據日本人自己的思維方法，來理解漢文佛典的。故由日本人倡導出來的任何宗派，無一不帶日本氣味。禪宗較為純淨而最切近中國風格，榮西及道元，也極力希望使得他們所傳的禪宗，酷似中國的風格，比如他們禪寺的施設配置，音響法器、衣飾、用具、食器、上殿、過堂，無不模仿得很像，但這些僅是形式的相像，日本禪宗的內在思想及其所產生的影響力，却是日本民族自己的東西，所以日本的禪，可以為武士階級所接受和利用而成為所謂武士道的狹隘的國家主義。因此，禪在中國，其目的在於破除煩惱而明心見性，日本的禪，雖然也以頓悟未有煩惱之前的本來面目為號召，却在追求這個目標的過程之

中，首先作了為其國家，實際上是為天皇崇拜而服務的工具。

註：

- 1 梁啟超的「中國佛教史研究」155頁云：「佛教為外來之學，其託命在翻譯，自然之數也。自漢迄中唐，凡七百年間，廣續盛弘斯業。宋元以降，則補苴而已」。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七五年印影。
- 2 中國的佛教，最初輸入於後漢時代，至隋唐而形成了具有中國色彩的各宗，例如隋代的天台、三論、三階等宗派；唐代則有淨土、華嚴、法相、律、密、禪等宗派。
- 3 日本佛教之公傳年代的資料有①「日本書記」（成書於720年）云為欽明天皇十三年（552年）起並流記資財帳」（747年寫成）同謂欽明天皇御世的戊午年（538年）。
- 4 a 「隋書」的「倭國傳」云：日本「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
- b 中村元的「東洋人の思惟方法」卷三3頁：「漢文漢字之傳入頗早，在推古之頃（593—628），部份的記載，已用之，影響及於一般，則甚難想像」。春秋社1974年第11版。
- 5 辻善之助的「日本佛教史」第一冊15頁云：「關於國字假名，最初是僧侶用來作為經典傍註解讀的，此亦伴隨着佛教而創始之物」。東京岩波書店1969年版。
- 6 中村元的「東洋人の思惟方法」第三冊4頁云：「以日本文寫作的思想性的著作，大約起始於鎌倉時代」。
- 7 島地大等的「日本佛教教理史」4頁云：「於佛教學中，縱觀日本佛教之地位，大約是中國佛教一個支流的發展」。東京明治書院出版。
- 8 辻善之助的「日本佛教史」第一冊46頁。
- 9 a 野上俊靜等人共著「佛教史概說——中國篇」14頁。京都平樂寺書店1974年版。
- b 林屋友次郎著「佛教研究」第一卷98—99頁。東京三省堂1936年版。
- 10 「後漢書」卷27「楚王英傳」。
- 11 佛教與儒道二教之間爭執問題之多，可以從大正藏經第52卷史傳部第四冊中，收集有關資料共計19種124卷可知。常盤大定所著「支那における佛教と儒道教」，亦足參考。東洋文庫1966年重版。
- 12 宋代歐陽修的「新唐書」，故意忽略佛教，宋明以來的儒家學者，大多主張排斥佛教。
- 13 a 錢穆的「國史大綱」上册99頁：「惟漢室初尚黃老無為，繼主申、韓法律」。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再版。
- b 塚本善隆的「中國佛教通史」第一卷34頁鈴木學術財團1968年版。
- 14 與王臣護法及佛法護國的有關經典，有名者是「金光明最勝王經」、「仁王般若經」、「法華經」。別有「梵網菩薩戒經」則強調王臣應受苦薩戒。
- 15 「俱舍論」卷13、「灌頂經」卷12，均詳明輪王以十善法治理其國民。

16. 其他尚有北齊之武帝、隋之文帝、煬帝、唐之則天武后，乃至清代的雍正帝等，多少均對佛教有所護持，但離佛教的輪王觀念尚極遠。他們無一人曾以佛教思想治國。
17. 參看拙著「世界佛教通史」上402頁。台灣中華書局1969年。
18. 參考塚本善隆的「中國佛教通史」第二章第四節「關於後漢明帝之感夢求法說」。
19. 日本派僧人到中國求法的最早記載，見於「隋書」倭國傳中說，推古天皇於大業三年（607）「遣使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
20. 中國史上，也曾有過政府派沙門西往天竺求法的記載，唯其例子極少。我們見到的僅如下列而已。①「佛祖統紀」卷38，載有北魏孝明帝正光二年（521）至四年，勅宋雲沙門法力等，往西天求經。大正藏經卷49，355頁下。②「佛祖統紀」卷43載有宋太祖乾德四年（966）沙門勤行等一百五十七人應詔，被遣往西竺求法。大正藏經卷49，395頁。
21. 「慈恩傳」卷一：「於是結侶陳表，有詔不許」。大正藏經卷50，222頁下。又云：「時國政尚新，疆場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著」。大正藏經卷50，223頁上。
22. 「宋高僧傳」卷14的鑿真傳，未見禁止其出國的記述。鑿真東征日本的資料，在日本則相當多。參考石田瑞磨的「鑿真之思想與生平」54頁之註。東京大藏出版社1958年。
23. a 中國佛教史上，皇帝終生出家之事例，雖未見過，王室中人出家者，見於「佛祖統紀」卷38的有如下數例：①北魏太和19年（495）京兆王子興，久病，祈佛獲愈，願捨王爵，求出家，表十上，乃許。大正藏經卷49，355頁中。②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太后馮氏出俗為尼，居瑤光寺。同上355頁中。③北魏宣武帝延昌四年（515），太后高氏出俗為尼，居瑤光寺。同上355頁中。④北魏孝帝永安元年（528），高氏胡氏出俗為尼，居瑤光寺。同上356頁上。
- b 日本史上天皇或上皇出家為僧的統計資料，見於辻善之助的「日本佛教史」第一冊3頁。
24. 參考村山修一的「神佛合一思潮」一書，京都平樂寺書店1957年出版。
25. 參考道端良秀的「佛教與儒教倫理」第四章及第十章。京都平樂寺書店1974年出版。
26. 參考辻善之助「日本佛教史」第一冊七頁。
27. 參考同上書第一冊436—489頁。
28. a 「清淨法行經」的經目，初見於「三藏記集」卷四，次見於法經錄及歷代三寶記。此經雖被疑為中國人撰作的偽經，並且現已不存在。但曾被僧順的「析三破論」所引，見「弘明集」卷八，大正藏經第52卷53頁下。又被北周道安的「二教論」所引用，見「廣弘明集」卷八，大正藏經第52卷140頁上。
- b 吳時支謙所譯的「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一，亦有：「及其變化，隨時而現，或為聖帝，或作儒林之宗，國師道士，在所化現，不可稱記」。大正藏經第3卷，473頁中。此處的儒林之宗，國師道士「係指印度的各派學者及各宗教的修行之士。當不是指的中國的儒道二教的孔孟及老莊之徒。
29. 「老子化胡經」相傳為東晉時代的道士王符所作。除此之外，早在「後漢書」之「襄楷傳」，已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之語。又在「齊書」的「顧歡傳」，也有「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破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兩種資料，一在東晉之先，一在東晉之後，可知，老子化胡為佛陀之說，在道教方面，宣傳的時間相當地長。
30. 參考湯用彤的「中國佛教無十宗」。刊於中國的「哲學研究」1962年第三期。
31. 中國佛教史上，由某一宗派的力量激盪而起兵變暴動，絕對未曾見過，然由個別的僧侶或寺院糾合而起的所謂教匪事件，除了白蓮教匪之外，①北魏時代的一百四十年間，教匪事件迭起。此可參考塚本善隆的「北朝佛教史研究」141—185頁，東京大東出版社1974年。②「史淵」雜誌三號68—103頁所載重松俊章的「唐宋時代之彌勒教匪」，1931年。我們是沒有忽略的。
32. 根據大乘戒經所示，有出家菩薩及在家菩薩，比丘係受了比丘戒而得名，若加受菩薩戒，則稱為菩薩比丘，未見受了菩薩戒的比丘，應捨棄比丘戒的規定。最澄標新立異，捨比丘戒而另創圓頓菩薩戒。所以有人懷疑，他是因為不能守持比丘戒而捨戒，還是為了要與南都的舊佛教對抗而捨戒，頗堪研究。由於最澄的捨戒

，以致從他之後凡與天台宗有關的各宗僧侶，無有一人是比丘了。

33. 日本的佛教教匪，稱為一揆，自十五世紀後半期開始，可舉者，有一向一揆、永正一揆、享祿一揆、天文一揆、弘治一揆、三河一揆、近江一揆、伊勢長島一揆、天正一揆、法華一揆等。

34. 從織田信長的文書中，看到他對當時佛教團體的指控：「不勤於佛事學問，專於奢侈遊樂。組織遊離的武士，兵亂相交結，為國家之靈害。」因此而於1571年攻燒了比叡山。取材於辻善之助的「日本佛教史」第七冊一及二頁。

35. 中村元的「東洋人の思惟方法」第三冊167頁說：「上官的命令即是天皇的命令」。像這樣連鎖式的特定個人崇拜，在中國及印度是不存在的。

36. 此在日本史上最著名的例子，是發生於1701年，赤穂義士，為他們的主人報仇。家臣四十七人，於1702年擊敗仇家，並將其頭顱割了，祭拜於主人的墓前。後來，四十七人全部被捕，賜死於1703年，葬於東京的泉岳寺。日本的名歌劇「忠臣藏」即據此史實改編而成。佛教不主張復仇，這是毫無疑問的，日本佛教界對於赤穂義士的行動，則從未有過異議。

37. 日蓮的「遺文」集中所收日蓮所寫「右衛門大夫殿御返事」(給其信徒的一封信)中他說到：「日蓮也像是上行菩薩的使者，弘揚此法門的緣故……。務須體會到上行菩薩再生的人」。實際上他雖沒有露骨地自稱他是上行菩薩

的再生，他已自覺到他是負起這項使命的那個人。故其有點類似基督教的耶穌，或回教的穆罕默德，他有一股強烈的創教主的自信心。

38. 中國的大小乘十三宗，日本的顯然以為在第五世紀初頭以來至六世紀後半期之間，已有了毘曇、成實、律、三論、涅槃、地論、淨土、禪

、攝論的九宗，再加上完成於隋唐時代的天台、華嚴、法相、密的四宗，即為十三宗。其實這是有疑問的說法，因在隋唐之前，雖有研究諸經論的人，並未有因研究範圍的限定而成立宗派之說。何況律、三論、淨土、禪，的形成各別的研究成果或發展的成果，乃在隋唐時代。

39. 臨濟、禪仰、曹洞、雲門、法眼，加上再由臨濟宗派生出來的黃龍、楊岐，合稱為五家七宗。

40. 參考常盤大定的「支那佛教史蹟踏查記」序的三一五頁。東京龍吟社1938年出版。

41. 荀子勸學篇。

42. 依據道元的傳記資料，1227年秋，道元歸國之前，向如淨告辭，如淨授給他袈裟等物，並告誡他說：「歸國布化，廣利人天，莫住城邑聚落，莫近國王大臣，只居深山幽谷。接得一個半個，勿令吾宗教斷絕」。取材於辻善之助的「日本佛教史」第三冊274頁。

43. 另有①律宗的豐安、於330年撰寫的「戒律傳來記」中說：「鎮護國家，戒律為首」。②最澄的「顯戒論緣起」、「守護國界章」。③空海標榜：「為國家薰修」、「鎮國護法」。此皆強調國家觀念的護國思想。參考中村元的「東洋人の思惟方法」第三冊149—152頁。

44. 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所謂入唐八家(最澄、空海、圓行、常曉、圓仁、慧運、圓珍、宗叡)，在中國期間，不是用筆談，就是帶有譯語的人員。參考圭室謙成的「日本佛教史概說」41頁；中村元的「東洋人の思惟方法」第三冊6頁。

45. 「東洋人の思惟方法」第三冊6頁。

46. 同上書7頁。

47. 同上書9頁。

48. 參看本稿第37註所引日蓮的遺文。其實，上行菩薩是「法華經」的「從地涌出品」及「如來神力品」中所見四大菩薩之一，經中並未特別強調上行菩薩的使命。照中國隋代智顛的「法華經文句」第九之上，是以四大菩薩表示開示悟入的四十位的，唐朝道暹的「法華經文句輔正記」第九，則以常樂我淨的四德來配釋上行、無邊行、淨行、安立行的四菩薩。日蓮却特重上行菩薩，與漢文的經義是很有出入的。

附 語

本稿的英譯本，係應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宗教系的邀請，上(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及二十四兩日，講於該大學的維多利亞學院。本文作者於一九七五年獲得日本東京立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之後，即被紐約的美國佛教會邀請，擔任教義研究及推廣工作。作者是亞洲學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會員、國際佛教教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創始會員。